

本报记者邹声文、顾钱江、许雪毅

走进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，毛泽东诗词《渔家傲·反第二次大“围剿”》赫然在目。“赣水苍茫闽山碧，横扫千军如席卷……”，豪放词句定格了这样一幅画面：1931年5月，红军“七百里驱十五日”，从赣江边打到闽西，自西而东横扫国民党军队，第二次反“围剿”取得大胜。

“福建是革命老区，党史事件多、红色资源多、革命先辈多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有独特优势。”今年3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如是说。

作为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，红军的故乡、长征出发地、将军的摇篮，福建在党史上留下极为鲜明的印记。

为了一个可爱的新中国，10万八闽儿女走进红军、新四军和游击队的行列，其中近3万人参加长征；全省为革命牺牲的烈士6万多人，被杀害和被摧残致死的革命群众约达47万人。

百年党史是一部浩如烟海的大书，其中有无数鲜活的细节值得触摸。让我们走进“红旗不倒”革命老区福建，寻找八闽大地的红色地标，从地理看历史，守望一代代共产党人用奋斗和牺牲立起的精神丰碑。

古田会议：红军浴火重生

初夏的闽西上杭古田镇，漫山青翠，溪水潺潺，穿着红军服的“红色文化研学之旅”成员，唱着革命歌曲，走进古田会议会址瞻仰。会址背后的山上，“古田会议永放光芒”八个红色大字庄严夺目。

古田会议会址，原为“廖氏宗祠”，又名“万源祠”。这让古田镇溪背村村民廖永忠十分自豪。

1917年，古田第一所小学“和声小学”在万源祠成立。1929年5月，红四军第二次入闽，把“和声小学”改名为“曙光小学”。至今，古田会议会址外墙上，还保留着红军留下的标语“保护学校”。

彼时，中国共产党诞生不到10年，建军刚刚2年，红军成分日益复杂，矛盾涌现，出现单纯军事观点、极端民主化、流寇思想等非无产阶级思想。1929年12月，毛泽东主持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，通过了“古田会议决议”，明确“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”，实现了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、凤凰涅槃。

古田会议指明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——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，即“思想建党、政治建军”，解决了“为谁而战”的根本性问题。”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曾汉辉说。

作为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，1961年，国务院将古田会议会址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曾为廖氏宗祠大厅的三合土地面，至今犹见斑斑痕迹。92年前那个冬日，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围坐在这里，为了御寒他们生起炭火盆。那是炭火，也是革命的火苗、胜利的火苗。

小屋里的预言：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

群山环绕的上杭县古田镇赖坊村，因一座名叫协成店的旧式民居，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；而当离开时，人们已经牢牢记下八个字：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。

没错，这里正是毛泽东写下指引中国革命道路的名篇《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》的地方。

“协成店”，原是一位商人的商号。一楼的厢房有间小屋：一张半米高、一米来宽的木板床，与临窗摆的简单桌椅，几乎占满整个房间，床下一双旧草鞋，墙上一顶斗笠，桌上一盏煤油灯。

寒冷的冬夜，毛泽东正是在这间“陋室”里，借着案头油灯的“星星之火”，奋笔疾书，预言红色革命必将迎来燎原之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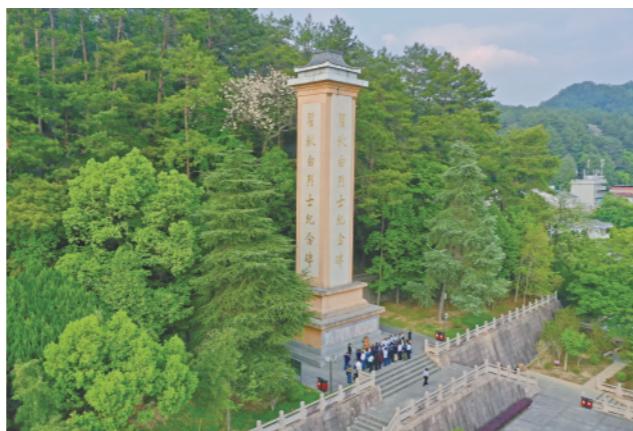
那是1930年1月初，确立“思想建党，政治建军”的古田会议刚刚开完，党内却仍有不同的声音。有人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把“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”“红旗到底能打多久”等问题丢给毛泽东。

“朱毛红军因国民党军围剿，

百年党史的『福建地标』



上图：古田会议会址。
本报记者姜克红摄



左图：福建省长汀县瞿秋白烈士纪念碑。
本报记者姜克红摄



右图：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协成店。
上杭县委宣传部供图

从井冈山一路转移，直到闽西根据地才立稳脚跟，后又因建党建军理念分歧，连打了几个败仗。”曾汉辉说，这种疑惑在当时的党和军队中有一定代表性。

1月5日，毛泽东在完成阻敌战斗任务后住进协成店，当晚，写下一封六七千字的回信，希望帮助部分人员提高认识，转变思想，并教育全军。

信中，毛泽东指出，“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”，提出革命的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的著名论断，并以诗意的语言形容那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——

“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，它是立于高山之巅遥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，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婴儿。”

果然，不到20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。

长汀罗汉岭：瞿秋白高唱《国际歌》，留下人生最后影像

在古城长汀，背靠罗汉岭，高大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静静地矗立着。

1935年2月，红军长征后留守苏区、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奉命从瑞金转移到上海从事革命工作，在向闽西突围时不幸在长汀梅迳村被捕。

6月18日，瞿秋白用俄语一路高唱《国际歌》，在罗汉岭一处草地英勇就义，年仅36岁。

在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前，瞿秋白留下人生最后的影像。照片中的他，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，下身为白布过膝短裤和黑线袜，足蹬黑布鞋，背着双手，昂首直立，神态自若。

在罗汉岭，瞿秋白环视四周“山上青松挺秀，山前绿草如茵”，脱口而出“此地甚好”，便在草地旁盘腿而坐，含笑饮弹。

为缅怀先烈、激励后人，1952年，长汀在瞿秋白烈士就义地，兴建了“瞿秋白烈士纪念塔”；1965年修缮后改称“瞿秋白革命烈士纪念碑”；2006年又兴建了瞿秋白烈士纪念馆。

距此不远的长汀县博物馆，曾为汀州试院所在地，又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。博物馆一角，有处逼仄的房间，曾是关押瞿秋白的地方。瞿秋白人生中最后一段时光就在这里度过，共被关押了41天。

在这间临时囚室里，瞿秋白面对敌人各种利诱、劝降、威逼，始终不为所动。他在这看书、写诗、刻图章，留下《多余的话》和《卜算子·咏梅》等作品。

囚室外的石榴树，见证了瞿秋白的最后岁月。“这棵石榴树年开花，依然鲜艳，正如瞿秋白坚

守的革命信仰那样，生生不息。”博物馆讲解员李艳斌说。

宁化：“千担纸、万担粮”，这里有个“中央苏区乌克兰”

三明市宁化县河龙乡，村民伊宏声和妻子正冒雨犁地、插秧。宁化是全国产粮大县，河龙乡种贡米已有1000多年历史。

作为中央苏区核心区、长征出发地之一，宁化为红军筹粮筹物，赢得“中央苏区乌克兰”美誉。

“红军来了打土豪分田地，农民翻身做主人，哪能不支持红军呢？”伊宏声说。

“千担纸、万担粮”，1931年至1934年，宁化累计为红军捐献粮食二十余万担，仅1934年就捐献十万余担。

“别看捐粮这么多，那可都是‘一粒米、一口饭’省出来的。”宁化县党史与地方志委员会党史股股长谢丽梅说。

为支援前线，宁化苏区妇女连经常赶制布草鞋，共捐献了20万余双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期间，宁化群众自发将家中门板拆下来送到前线做担架、病床。

当时，宁化还建立了红军兵工厂和被服厂，建设中央苏区造纸业生产基地，办起了硝盐、樟油、铁业等生产合作社。

宁化群众参加红军十分踊跃，出现了兄弟同参军、父子齐上阵、夫妻一条心等动人场景。

“那时整个县城几乎找不到二三十岁的男丁，大家都去参加红军了。”96岁的邹绍良说。

在淮土镇凤凰山，红四军驻地暨“扩红”指挥部旧址，一棵400多年的老槐树见证了张恩铜和他新婚一个多月的妻子苏琴英成为“第1001名”和“第1002名”红军的故事。

史料记载，1929年3月至1934年10月，宁化县16000多人参加红军。当时全县总人口13万多人，相当于每8人中就有1人参加革命，是福建中央苏区县中参加革命人数最多的县之一。

漳州芝山红楼：毛泽东军事思想崭露头角

在福建漳州中心城区，有座三层小红楼——芝山红楼。当年，它与红军只有短短一个多月的交集，如今，作为“毛主席率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”，芝山红楼地位独特。

在这间临时囚室里，瞿秋白面对敌人各种利诱、劝降、威逼，始终不为所动。他在这看书、写诗、刻图章，留下《多余的话》和《卜算子·咏梅》等作品。

红楼外墙上一行大字“组织民族革命战争，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”，将人们的思绪带

回1932年——那年春天，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翻过武夷山，跨过汀江，一路攻下漳州。

攻克漳州后，毛泽东曾在芝山红楼居住、工作20多天。这期间他主持召开东路军师以上干部会议，并亲自指导地方党组织，为发展闽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。

如今，红楼内毛泽东工作过的房间，依然陈列着煤油灯、单人床以及一对马口铁做的箱子等物件。岁月仿佛在此凝固。

漳州战役的胜利在当时是一场“及时雨”。“由于‘左’倾路线，红军在赣州战役中失利，在此背景下，毛泽东率领的东路军在漳州战役中大获全胜，不仅一扫阴霾，也奠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地位。”纪念馆馆长郑爱清说。

红楼里有张照片记录了战果，照片上是两架飞机——这是中央红军首次缴获飞机，一群年轻人满是好奇地围观着。

照片背后还有一个故事：当时11师政委刘亚楼也在围观者中，22岁的他满脑子都是“飞行梦”。17年后的开国大典上，他如愿成了人民空军首任司令员。

厦大党支部成为闽西南地区建党的发祥地和播种机、革命运动的策源地，被誉为“八闽大地的革命摇篮”。

时光荏苒，“囊萤之光”永续向前。1986年，厦大校园内建起罗扬才烈士塑像。罗扬才烈士所代表的革命精神成为厦大“四种精神”之一。2019年7月，厦大发起“扬才计划”，成立了“扬才先锋党支部”。

“我们要让囊萤之光历久弥新、永不衰朽。”厦大党建办公室主任廖志丹说。

福州“雨花台”：一场感人至深的“刑场婚礼”

作为港口城市，漳州在数百年海外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。漳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陈子铭说，红军进漳后，原本在簇叔钱庄做出纳的当地青年高捷成毅然加入红军，并在随后一个多月里，协助红军奔走筹得100多万元银元和大量物资。

那时候，在有着“红色小上海”之称的长汀，这一数字也不过是5万元。

当时，漳州有1500多名青年加入红军。报名参军的除了贫困百姓，还有南山寺7名和尚，以及在闽南求学的30多名台湾学生。

“红军给这座城市带来生生不息的火种。”漳州市党史办副主任曾一石说。

史料记载，1929年3月至1934年10月，宁化县16000多人参加红军。当时全县总人口13万多人，相当于每8人中就有1人参加革命，是福建中央苏区县中参加革命人数最多的县之一。

史料记载，1929年3月至1934年10月，宁化县16000多人参加红军。当时全县总人口13万多人，相当于每8人中就有1人参加革命，是福建中央苏区县中参加革命人数最多的县之一。

上世纪初，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家乡厦门集美创办集美学校，培养了诸多进步学生。罗扬才与李觉民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两位。

1924年，罗扬才考进厦门大学预科。次年12月，他升入厦门教育系学习，住在囊萤楼111室宿舍。

作为鸡角弄烈士、首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方尔灏的后人，方正一直在为这处红色地标奔走呼号。他掏出一本纸页泛黄、手工整理装订的“书”说：“这是我们烈士后人联谊会多年来搜集的鸡角弄烈士事迹传记。但还不完整，有很多烈士没留下姓名和记录。”

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起，先进青年翁良毓、方尔灏等先后成立了福州首个共青团和党组织，这也是福建最早的地方党组织之一。他们领导工、农、学、妇运动，传播马克思主义，把福州地区的革命活动推向高潮。

1927年4月，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地大肆屠杀共产党员

厦大由陈嘉庚先生1921年独资设立，是中国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。“囊萤”的典故，出自《晋书·车胤传》：“胤恭勤不倦，博学多通，家贫不常得油，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以照书。”

1925年11月和第二年1月，罗扬才和李觉民先后到广州参加会议，两人被会上的共产党临时支部吸收入党。为加快厦门地区建立党组织，中共广东区委调派广东大学学生党员罗秋天转学厦大。

1926年2月，罗扬才、李觉民和罗秋天三位共产党员，在囊萤楼111室宿舍内举行秘密会议，宣告福建省第一个党组织——中共厦门大学支部诞生。

从此，代表真理与革命的“囊萤之光”，以燎原之势，推动闽南、闽西地区革命迅猛发展。到1927年厦门“四·九”政变、罗扬才英勇就义前夕，厦大党支部已在闽西南地区建起28个党支部，发展了近300个党员。

厦大党支部成为闽西南地区建党的发祥地和播种机、革命运动的策源地，被誉为“八闽大地的革命摇篮”。

时光荏苒，“囊萤之光”永续向前。1986年，厦大校园内建起罗扬才烈士塑像。罗扬才烈士所代表的革命精神成为厦大“四种精神”之一。2019年7月，厦大发起“扬才计划”，成立了“扬才先锋党支部”。

“我们要让囊萤之光历久弥新、永不衰朽。”厦大党建办公室主任廖志丹说。

福州“雨花台”：一场感人至深的“刑场婚礼”

鸡角弄被称为福州“雨花台”。新中国成立前，这里是福州的监狱、刑场。经历百年沧桑的荔枝树见证，180多位烈士在这里为革命献出一腔热血。

作为鸡角弄烈士、首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方尔灏的后人，方正一直在为这处红色地标奔走呼号。他掏出一本纸页泛黄、手工整理装订的“书”说：“这是我们烈士后人联谊会多年来搜集的鸡角弄烈士事迹传记。但还不完整，有很多烈士没留下姓名和记录。”

作为鸡角弄烈士、首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方尔灏的后人，方正一直在为这处红色地标奔走呼号。他掏出一本纸页泛黄、手工整理装订的“书”说：“这是我们烈士后人联谊会多年来搜集的鸡角弄烈士事迹传记。但还不完整，有很多烈士没留下姓名和记录。”

上世纪初，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家乡厦门集美创办集美学校，培养了诸多进步学生。罗扬才与李觉民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两位。

1924年，罗扬才考进厦门大学预科。次年12月，他升入厦门教育系学习，住在囊萤楼111室宿舍。

史料记载，1929年3月至1934年10月，宁化县16000多人参加红军。当时全县总人口13万多人，相当于每8人中就有1人参加革命，是福建中央苏区县中参加革命人数最多的县之一。

史料记载，1929年3月至1934年10月，宁化县16000多人参加红军。当时全县总人口13万多人，相当于每8人中就有1人参加革命，是福建中央苏区县中参加革命人数最多的县之一。

史料记载，1929年3月至1934年10月，宁化县16000多人参加红军。当时全县总人口13万多人，相当于每8人中就有1人参加革命，是福建中央苏区县中参加革命人数最多的县之一。

史料记载，1929年3月至1934年10月，宁化县16000多人参加红军。当时全县总人口13万多人，相当于每8人中就有1人参加革命，是福建中央苏区县中参加革命人数最多的县之一。

史料记载，1929年3月至1934年10月，宁化